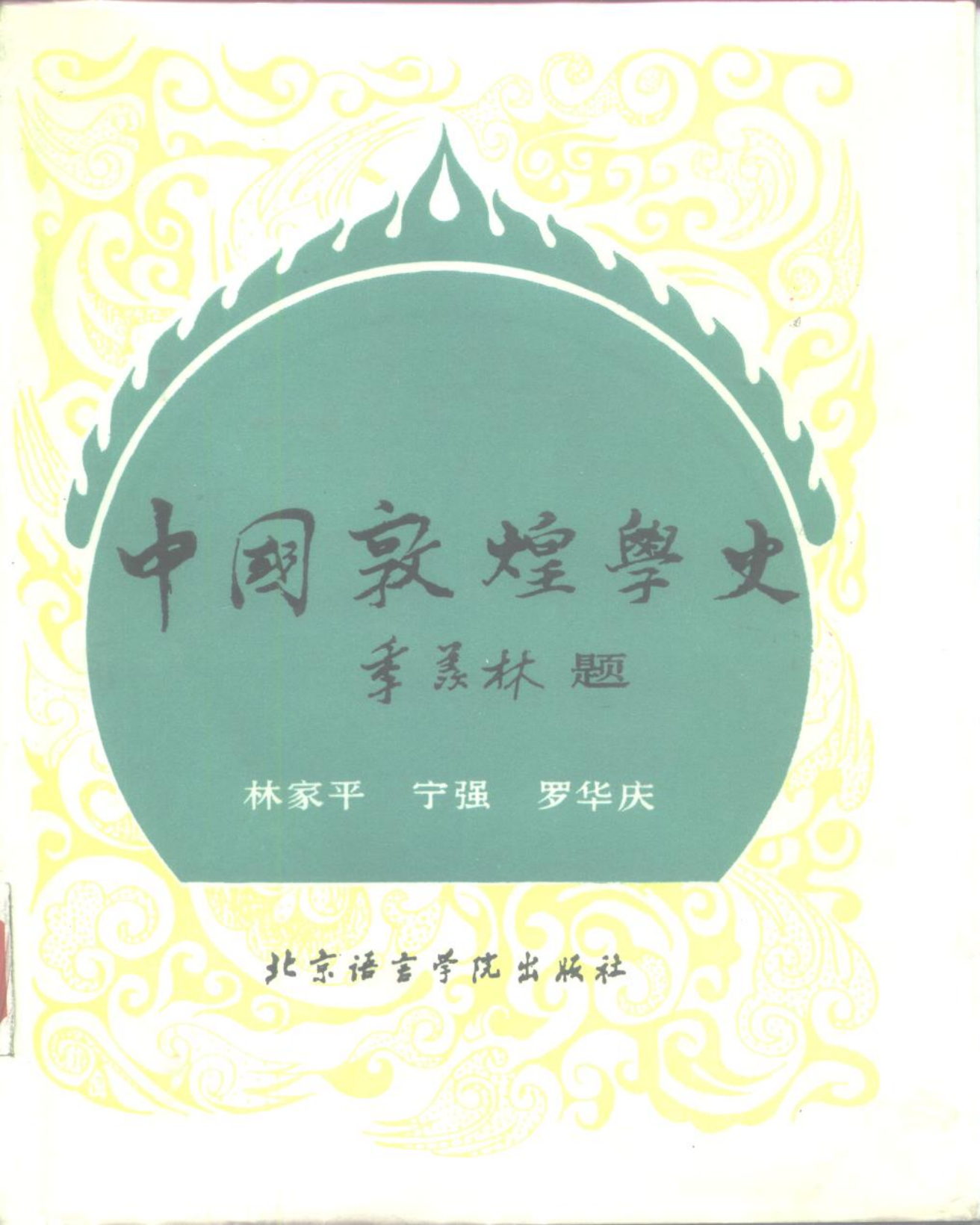




中國敦煌學史

季羨林題

林家平 宁强 罗华庆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中国敦煌学史

林家平 宁强 罗华庆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敦煌学史/林家平等著—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ISBN 7-5619-0183-6

I. 中…

II. 林…

III. 敦煌学-历史-中国

IV. K870.6-092

Ⅲ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20 36 印张 彩插 6 660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4000 册

定价:45.00 元

绪 论

一、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征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宋代另开海外贸易之前，一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联结中原和西域、中亚以至欧洲的“咽喉之地”，当时被誉为“华戎所支一都会”（《续汉书·郡国志》引《耆旧记》语）。敦煌也就成为“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之一。

敦煌学(Dunhuangnology)是“因地名学”。敦煌作为中西文化的交融点，其特定的时空概念规定了敦煌学的特殊内涵。敦煌学赖以成立的基础不外乎敦煌地区遗留下来的文物文献资料，而这些资料产生于古代敦煌地区，比较真实而全面地反映着古代敦煌特有的历史风貌。同时，它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亚史研究，乃至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自公元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和千佛洞遗迹被再发现起，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不算太短的时期内，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发现的新资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逐渐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敦煌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学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大批优秀学者加入到敦煌学的研究行列中来，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敦煌学成为一门“显学”。但是，究竟什么是敦煌学？它的范围和特点是什么？这些都是很有争论性的问题。如果对敦煌学的概念理解有出入，就可能造成理论上的分歧和混乱，势必阻碍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现在给敦煌学划一个

科学的界定范围是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的。

(一)

“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首先提出来的。但其含义仅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而言。1940年，向达先生修订《唐代俗讲考》时仍持此说（参阅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95页）。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敦煌学概念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周一良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1983年5月周先生为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所作的《序》，见《敦煌文学研究通讯》第3期）。第二种观点以姜亮夫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敦煌学最主要的内容有二：一为莫高、榆林诸石窟寺的壁画、塑像、浮雕等；一是千佛洞窟所发现的一大批卷子，此外还要加上新疆吐鲁番、甘肃酒泉、玉门一带的文物，乃至青海的资料”。（参阅姜亮夫《敦煌学规划私议》、《敦煌学规划之一》。）

此外，香港学者苏莹辉、日本学者榎一雄等，也对敦煌学的含义作过一些论述。

周一良先生等人的观点，比较多地强调了敦煌资料各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否定了这些资料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而否定了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姜亮夫先生等人把敦煌学的范围过分扩大，不但影响了这门学科内涵的确定性，而且还混淆了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学与敦煌学之间的分野。所以，上述两种有关“敦煌学”含义的观点都失之偏颇，不够准确。

我们认为，敦煌学的概念内涵应有三个层次：第一，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第二，对这些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第三，指导这种研究的科学理论。

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物文献资料，主要指古敦煌郡（即瓜、沙二州）境内（今敦煌、安西两县境内）的资料。其中文献部分包括1900年5月26日在藏经洞发现的和1944年8月30日在土地祠残塑中发现的经卷文书。藏经洞所出经卷文书总数约5万卷左右。这些经卷以文字分主要有：古汉文、古藏文、梵文、古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和古突厥文等经卷；以性质分可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四大类。这些卷子现在分藏于英国、法国、苏联、中国和日本等国。千佛洞对面土地祠残塑中发现的经卷杂文等60种、残片32片，主要度藏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外，还有一些在敦煌一带收购的零星残卷等。

文物部分以敦煌千佛洞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和小千佛洞（水峡

口) 加上藏经洞所出的遗画(包括绢画、纸画、麻布画、遗书插画和刺绣物)为主体, 还要包括今敦煌、安西两县境内的莫高窟窟前遗址、两关(阳关、玉门关)遗址、古城(古敦煌城、古效谷城)遗址、古墓葬、古董滩出土的木简、古碑文、古建筑(包括古长城境内部分、古塔)等。

这些文物文献资料, 大都产生于古代敦煌, 共同的时空范围, 使它们之间必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遗书与遗书之间、遗书与遗画以及佛窟之间、佛窟与佛窟之间、佛窟与墓葬以及建筑之间、遗书与古城遗址之间、木简与古碑以及遗书之间紧密交错地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着古代敦煌特有的历史身影, 从中也可窥见中国古代史、中西陆上交通史、中亚史的一些侧影。

如 P. ①4524 号代图本《降魔变》, 一边是变文, 一边是变相, 遗书与遗画之间的紧密关系一目了然。P.2555 号唐人写卷, 抄录诗 189 首、赋 1 首、文 2 篇, 反映着当时河西陇右边塞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既是文学资料, 又是史学资料, 因其抄写年代离写作年代较近, 又有很大的校勘价值。此外, 对古地名、地理之考证亦有诸多帮助。又如敦煌西千佛洞第 10 窟的壁画《祇园记图》, 根据所表现的内容和榜题来推查, 此图是依据《贤愚经》第十《须达起精舍品》来描绘的, 而在敦煌莫高窟第 335 窟则画作《劳度叉斗圣变》(参阅金维诺《敦煌壁画〈祇园记图〉考》, 见《敦煌变文论文录》)。再如莫高窟第 321 窟南壁壁画《宝雨经变》是根据《宝雨经》绘制而成的。这些都反映着遗书与石窟艺术的密切关系。S. ②0610 号卷子《新集时要用字》中“音乐部”记载的“琵琶、箏、笛、筚、箫”等乐器都可在敦煌壁画中找到对应的形象。所以说, 敦煌资料并非任人取用的一盘散沙, 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敦煌学作为一门定型学科在中国诞生于 40 年代前期, 但对敦煌资料的著录、整理、研究, 则发轫于清末民初。清末甘肃学政叶昌炽在其所著《语石》中就已著录了几件藏经洞所出的遗书。尔后罗振玉、王国维、刘复、陈垣、陈寅恪、王重民、向达、姜亮夫、任中敏(任二北)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整理研究, 取得很大成绩。但是, 作为敦煌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石窟艺术却研究甚少。

①P.代表伯希和藏卷。

②S.代表斯坦因藏卷。

40年代初期,我国考古学家、美术家纷纷来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向达、阎文儒、谢稚柳、何正潢等人,不仅踏查了大部分洞窟,抄录过碑文、题记,还对洞窟壁画的内容、建窟年代进行考证。何正潢先生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就是最早的一份“石窟内容总录”;向达先生于1943年写成的《西征小记》,对敦煌境内的古遗址、遗物作了许多论证;美术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诸位先后到敦煌和安西石窟临摹壁画,并撰文介绍敦煌石窟艺术。其中王子云先生率领的国民党教育部西北考察团和张大千先生于1941年率子侄、夫人和五位藏族画工一行算是规模较大的两批。他们临摹的壁画曾在内地展出,引起学术界和美术界的一致重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亦随之撰文介绍、评论,一批关于敦煌艺术的论文涌现了出来。如傅振伦先生的《敦煌艺术论略》、震雷先生的《敦煌的佛教美术》、宗白华先生的《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等等。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先生任所长,并从内地征聘了一大批美术工作者和美术史家到敦煌来,临摹了大批壁画。同时,也进行了洞窟内容调查和测量,抄录了“供养人题记”,发表了不少文章。临摹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研究过程。中国的敦煌学,伴随着石窟艺术研究的开始,终于成为一门严整的学科。从此以后,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并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在敦煌学范围内又开拓出一些新领域,如敦煌石窟美学、敦煌民俗学和敦煌寺院经济研究等等。

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的研究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把敦煌学研究引向深入的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这些经验和成果,找出规律,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总的指导纲领,结合中国敦煌学的具体情况,创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敦煌学理论体系,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敦煌学自身的发展不仅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也为此准备了前提条件。

首先,从资料上看,敦煌资料的各个部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客观前提。

其次,从研究本身来看,敦煌研究已有较长的历程,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这种研究本身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从方法论的角度找出研究规律,使从事敦煌学理论的研究有了可能。

第三,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我们有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有利条件。在作为敦煌资料中不可缺少重要组成部分——石窟艺术研究方面,我国在世界上已占有相对

领先的地位。这就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敦煌学理论体系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敦煌学成为一种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观点与方法紧密结合、结构谨严、融汇贯通的科学知识体系，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凑合。

(二)

敦煌资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敦煌学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同样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对这些领域的专门研究，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探索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性和共同的规律性则是建立敦煌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面。

敦煌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因此它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扩大。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敦煌学的各个研究范围作一简述。就目前开拓出的领域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敦煌史地。主要指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中西交通等方面的历史文献的研究；对敦煌、安西两县境内现存古代遗址、遗物的考古研究，以及对壁画中“供养人题记”有关敦煌史地记载部分的研究。就目前看，主要开展了莫高窟开凿年代、敦煌陷蕃年代和吐蕃统治时期社会情况、瓜沙史事、归义军始末、河西节度使活动情况、古城遗址、古地名考订、藏经洞封闭年代、敦煌民俗学、敦煌寺院经济、社邑文书、籍帐契约、法制文书以及碑文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第二，敦煌美术。主要指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小千佛洞诸石窟寺现存壁画、彩塑和藏经洞所出遗画的研究。目前涉及的方面主要有：敦煌美术的源流、石窟的分期断代、敦煌美术在东方美术史上的地位、壁画内容的考订、敦煌的“画院”与“画行”、敦煌艺术与现实之审美关系、敦煌图案研究、彩塑研究、彩塑与壁画的关系、塑画中人物的衣冠服饰、壁画临摹和彩塑复制、敦煌石窟美学、敦煌美术的继承与创新等。

第三，敦煌建筑。主要指对敦煌石窟中有关建筑的资料和窟前建筑遗址以及敦煌地区内遗存的建筑（包含古塔）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不够充分，主要是对壁画中的古代建筑和莫高窟第53窟窟前建筑遗址以及敦煌石窟宋初窟檐与北魏洞窟内的斗拱等作了一些探索。最近，有学者写出《莫高窟附近的两座宋塔》，开始了对莫高窟外敦煌古建筑的研究。

第四，敦煌乐舞。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1)遗书中的乐谱、舞谱和其它有关乐舞的文字记载；(2)敦煌造型艺术中有关乐舞的资料。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曲谱译

解、古代乐器考释、古舞蹈与舞姿研究、古代舞蹈实践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等。鉴于敦煌舞谱记录符号的抽象性与舞蹈动作的具象性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敦煌乐舞仍是个有待深入研讨的课题。

第五，敦煌宗教。主要指对敦煌遗书中有关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资料的研究。就目前看，微观研究较多而宏观研究较少。在探索佛教经典与壁画之间的关系、石窟与禅观、写经题记、河西高僧传以及对某部宗教经典的研讨方面有一定水平。

第六，敦煌文学。指对敦煌遗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其中有诗文、俚曲小调、曲子词、讲唱故事（变文、词文、话本、故事、赋以及讲经文等）。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一般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与要求，而且是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的写作形式与手法。当然，还有一些仅见于敦煌遗书中的文人作品。对敦煌文学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文章和专著问世不少。如王重民等人的《敦煌变文集》、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张锡厚的《敦煌文学》、张鸿勋的《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高嵩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吴肃森的《论敦煌歌辞与词的源流》等。这些著述对敦煌文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开始将敦煌文学与壁画艺术结合起来研究，初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七，敦煌语言文字文献研究。其中对汉文写卷的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方面的研究成绩比较突出（如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对遗书中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古藏文、古于阗文、古突厥文、龟兹文、粟特文等）的研究尚少，与国外的研究水平差距很大。

第八，敦煌科技文献研究。敦煌遗书中有关科技的资料主要是关于古本草、古历日、印刷术、天文、算书、建筑等。对古本草、古历日的研究较多，也有些关于印刷术的研究，其他研究甚少。

第九，敦煌版本文献研究。敦煌遗书唐本最多，且有北朝写本。在遗书发现前，清人已罕见唐本，所以敦煌写本的版本文献学价值很高。目前从写本的装帧、纸张、书写方式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

（三）

敦煌资料产生于古代敦煌这个特殊的时空范围内，敦煌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这就使敦煌学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鲜明特征。

第一，交叉性。敦煌学不是边缘学科，而是交叉学科。它不仅与其他相关学科

部分地重叠交叉,而且敦煌学各部类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叠关系。边缘学科往往是随着科学的分化和整合而产生。一方面,它是科学分化而导致的专业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带有科学整合而导致的综合化痕迹。它与邻近学科的关系主要是“相接”而不是“相交”。敦煌学不是某门学科发展分化的产物,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敦煌学的研究有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零散的微观研究到形成学科的宏观研究的发展过程,它与邻近学科不是“相接”而是“相交”。如丝绸之路学的对象是中西贸易、交通,而敦煌曾是中西交通、贸易的“中转站”,因而许多敦煌资料,既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对象;而敦煌史地,既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北史地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再从敦煌学各部类之间的关系来看,在一个总的体系下,同样呈一种交叉结构状态。比如研究敦煌美术,由于其内容以佛经为依据,势必与敦煌宗教研究交织在一起;又比如敦煌壁画反映出许多生产场面,对它们的研究又是敦煌经济史的研究等等。

第二,立体性。由于敦煌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所以对敦煌学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方式,单纯地就某一部类的某一点进行研究,而要随时保持一种立体的眼光,进行全面的共时和历时的研究;即使对某一专题的研究,也应该放眼全局,充分运用各方面资料,并把专题放到广阔的体系中去探讨。比如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如果仅从壁画的构图、用笔、线条、色彩等角度着手,容易失之片面;而把壁画的研究与佛经、变文的研究、敦煌史地的研究联系起来,就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艺术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形式与内容变化的潜在历史动因,就能够将问题研究得比较深透;如果再把敦煌石窟艺术放到中国乃至世界石窟艺术的宏伟背景上来研究,无疑就会增强人们对敦煌石窟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崇高地位的认识。所以,注意敦煌学研究的立体性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敦煌学的内容丰富复杂,要进行综合的立体研究,研究者们的通力合作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国际性。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它的国际性不仅表现在资料收藏的国际性,研究队伍的国际性,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敦煌学研究价值的国际性。从敦煌民俗的研究看,它并不单纯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民俗问题。唐代风俗曾远播海外,传播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当今,在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华裔社会里,都能发现浓郁的“唐风”。敦煌民俗资料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唐代敦煌民风的反映。因此,研究敦煌民俗,必将推动以上国家和地区民俗学的研究,其国际性是很强烈的。再从敦煌佛教研究看,佛教本身是一种国际性宗教(与

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 流传地域很广。敦煌佛教资料保存着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古代佛教史料。敦煌佛教的研究, 将对整个佛教研究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敦煌是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点, 是世界文化结构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深入地进行敦煌学的研究, 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需要; 也只有把敦煌学放到世界文化体系这个宽广的背景上来研究, 才能满足它自身不断地深入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敦煌学史的分期

敦煌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学科, 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它从始萌到初兴, 再到形成一门独立学科, 经历了一个独特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具体而深入地对这个历史过程进行分析研究, 找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是我们研究敦煌学史的基础, 也是我们对敦煌学进行分期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以往的专家学者, 对敦煌学史早已作过某些探索和研究。如 1962 年, 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作的学术报告《敦煌七讲》(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油印稿) 就作过一个“分期”。他认为, 敦煌研究一般说来是从石室藏书的研究开始的, 以石室藏书为中心的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 从石室藏书的发现开始到民国十年左右;

第二期: 转入到欧洲找材料来研究的阶段 (民国十年到解放前不久);

第三期: 从解放前不久到现在 (1960 年)。

1982 年, 任半塘先生在《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江海学刊》1982 年第 1 期) 一文中认为, 敦煌学在国内显然已经经历了两个时期: 第一期以罗振玉等为代表, 他们从法国劫掠去的卷子中得到零星篇幅, 作了考据, 印发若干“佚书”、“丛残”、“零拾”之类; 第二期以王重民等为代表, 王和刘复、向达等人亲自到英、法等国采访遗书, 所见较多, 并编目、抄写、拍照, 回国后加以刊印。但这一时期“其势已竭”, 因而“应早辟国内敦煌学研究的第三期”。与此相似, 1983 年陈人之同志在《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一文中仍然承袭以人划期的作法(《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所有这些分期的方法与理论, 对理清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掌握各时期的研究特点, 更好地促进目前敦煌学的学术研究, 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当然, 限于历史的局限和资料的欠缺, 加之使用方法有失, 这些分期方法是否正确, 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敦煌学作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其概念内涵的基本要素不外有三个层次:一是材料,二是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三是指导这种研究的科学理论。要考察敦煌学史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研讨其从发轫到初兴,再到形成独立学科以至深入展开的发展过程,就必须从这个基本要素入手进行通盘掌握、深入分析。在材料方面,我们要考察材料的来源、范围和刊布以及使用情况;在研究方面,我们要分析研究的方法、范围和所取得的成就;在理论方面,我们要研讨是在什么背景上敦煌学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学者专家是否有意识地总结研究经验,探索研究规律,掌握研究手段,注意敦煌学说的建设等等。

基于对以上几个方面的讨论,我们把1909年至1983年75年间的中国敦煌学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敦煌学发轫时期(1909年——1930年)

第二期:敦煌学初兴时期(1931年——1943年)

第三期:敦煌学全面展开时期(1944年——1949年)

第四期:敦煌学深入发展时期(1950年——1966年)

第五期:敦煌学的新高潮(1976年——1983年)

我们把1909年定为中国敦煌学的起点,并不是意味着在此以前中国学者没有注意到敦煌千佛洞。事实上,中国学者对敦煌千佛洞开始注意,既非仅仅局限于敦煌遗书,也非从藏经洞发现之后才开始的。

尽管敦煌莫高窟远在西陲,但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遗存,它很早就引起我国学者的注目。清代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澐就写过《游千佛洞诗》,对敦煌艺术推崇备至:“神工劳擘划,匠手巧雕镌”,“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颠”。(参见《敦煌县志》、《西域水道记》)这是18世纪上半叶的事情,比藏经洞的发现要早100多年。嘉庆年间,著名的西北史地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对敦煌的历史和碑刻作了记录和研究。此外,他还论及莫高窟的创建历史。道光年间刊行的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哈喇卓尔所受西源党河”条下,记载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一向为人所重视。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间在敦煌任县令的许乃谷,也曾巡礼莫高窟,描述了莫高窟当时的景象,并介绍了莫高窟的碑石和有关历史;他的《千佛岩歌》收在其诗集《瑞芍轩诗钞》里。上述事实,是我国学士文人很早就注意到敦煌艺术和敦煌史地的明证。

1900年,千佛洞当家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通过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多件,作了最早的记录:“己闻石室

发现事，亦得画象两轴，写经五卷。”（事见《缘督庐日记》，转引自苏莹辉《谈敦煌学》）1907年，斯坦因到敦煌窃取大量文物，当时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记录、整理和刊布。所以把斯坦因首次抵达敦煌的时间1907年定为敦煌学的起点是不对的。

清宣统元年（1909年），我国学者王仁俊首先刊布《敦煌石室真迹录》。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专集。王仁俊对这部分资料分类编排，并以“按语”形式作了一些初步考证。这为以后敦煌遗书的搜集、整理、校勘与研究，做了拓荒性质的工作。所以，我们把1909年定为中国敦煌学的起点，而王仁俊则以其开山之功被载入敦煌学史册。

第一期（1909年——1930年），敦煌学发轫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著述有：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敦煌零拾》和存古学会的《石室秘宝》，蒋斧的《沙州文录》，罗福苣的《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和《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刘师培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刘复的《敦煌掇琐》，陈寅恪的《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郑振铎的《敦煌的俗文学》，向达的《论唐代佛曲》，等等。这些学者及其著述在搜集、辑录、校勘、编目和初步研究敦煌文献资料方面，具有拓荒的意义，功不可没。

纵观发轫时期的敦煌学，可以看出下列特点：

第一，从资料方面看：（1）来源有限。文献来源主要为伯希和劫走的敦煌卷子，少数为斯坦因劫走的敦煌卷子。《石室秘宝》刊有4幅莫高窟壁画的照片，虽是中国刊布石窟艺术照片之始，但为数毕竟太少。（2）刊布范围有限。主要是古写本四部书，尤其是经部和子部，也有少数社会经济资料和通俗文学资料。（3）发行数量有限。辑录、刊布这些资料的发行量不多，必然影响研究的广泛开展。

第二，从研究方面看：（1）研究的主要方法为考证文献本身，其形式是替某一文献作序跋或提要，开始了一些专题研究，但很不深入。（2）研究的范围集中在“四部书”，特别突出的是经、子二部，史、集二部很少研究。（3）研究者人数甚少，主要是北京的学者。

第三，由于研究尚属草创，研究本身还不具备成为研究对象的充足条件，因而理论方面似无建树。

第二期（1931年——1943年），敦煌学初兴时期。

本时期的代表人物及著述主要有：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及陈寅恪所作的“序”，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

录》及《金山国坠事零拾》，罗振玉的《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向达的《唐代俗讲考》，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何正潢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之调查》，以及张大千等人的大量的临摹作品等。

本时期是以陈垣《敦煌劫余录》的编纂刊行作为开始的标志的。这是我国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文献的目录书，共著录写卷 8679 号。陈寅恪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第一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总的来看，本时期与上一时期相比较，有了较大的进展，敦煌学进入了初兴时期，表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资料来源已不限于抄录伯希和带来的“赠品”，一些中青年学者奔赴巴黎、伦敦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回国整理研究。同时，由于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相继问世，“北图”所藏大批敦煌文献被利用起来。新资料的大量涌现，为敦煌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文献刊布范围越出“四部书”，俗文学资料、语言文字音韵资料、社会经济资料以及官府文书的刊布，使研究者拓宽了眼界，为敦煌学开辟了新的领域。敦煌艺术资料方面，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大谷光瑞的《西域考古图谱》、斯坦因的《Ruins of Desert Cathy》、《Serindia》和斯氏与宾戎的《The Thousand Buddhas》开始为个别学者利用，张大千等人的大批临摹品到重庆等地展览，为没有到过敦煌的学者提供了形象资料。

第二，研究方面：(1)研究的主要方法已由考证文献本身，写作简单的序跋、提要，一变而为利用新资料，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有真正意义的研究，因而水平大为提高。(2)研究范围完全突破“四部书”，展开多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关于归义军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唐代法制文书的研究；唐代俗文学研究；文字、音韵研究的科学化；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关于唐代地志的研究；对敦煌艺术的介绍与研究，等等。

第三，理论方面：陈寅恪已经意识到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发出“国人罕具通识”之叹（《敦煌劫余录·序》）。张鉴的《评陈垣编〈敦煌劫余录〉》（《浙江省图书馆馆刊》2卷4期，1933年6月）是对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品评，已属“敦煌学学”的范畴。胡适的《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3号，1936年5、6月）和陈寅恪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都属这类文章，这是前一时期的现象。

第三期（1944年——1949年），敦煌学全面展开时期。

本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及著述有：向达的《西征小记》和《罗叔言〈补唐书

张议潮传>补正》，傅芸子的《敦煌学三十年》，李子青的《莫高窟艺术志》，傅振伦的《敦煌艺术论略》，史岩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关德栋的《谈变文》，以及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临摹壁画的优秀临品。

本时期是以1944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正式成立为开始的标志的。中国学者从此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比较系统的有组织的临摹、研究，敦煌学赖以形成的两个基本方面——石室遗书和石窟艺术的研究得以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中国敦煌学从此正式形成一门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学科。这个时期时间跨度不大，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痕迹。但由于石窟艺术开始了系统的研究，因而这一时期的敦煌学研究产生了不同于以前两个时期的新特点。

第一，资料来源：(1)大批石窟艺术资料被介绍出来。(2)千佛洞土地庙残塑中新发现一批卷子。(3)敦煌地区的考古活动提供了一批新材料。从资料范围看，大大超越了遗书，增加了不少新的实物资料；从刊布范围看，各大报刊热衷于介绍敦煌，刊布敦煌资料，影响较前扩大。

第二，研究方面：(1)走出书斋，从事实地考察，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石窟与经卷相结合，新方法的出现使研究水平有了质的飞跃。(2)开始了对专题研究的集中讨论，使研究向纵深发展。(3)石窟艺术的临摹研究与洞窟保护相结合。

第三，理论方面：首先是重视敦煌学自身的发展。傅芸子的《敦煌学三十年》是第一篇敦煌学发展史的系统性的总结文章。此外，书评及争鸣的展开，也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第四期(1950——1966)，敦煌学深入发展时期。

本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著述有：向达的《敦煌艺术概论》，常书鸿的《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阎文儒的《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梁思成的《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阴法鲁的《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潘絮滋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姜亮夫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和《瀛涯敦煌韵辑》，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向达、王重民等人的《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录》，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编的《敦煌资料》(第一辑)，苏莹辉的《敦煌学概要》，以及劳干的《敦煌艺术》和夏鼐、宿白、金维诺、谢稚柳等人的有关论著等等。

本时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重要标志。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敦煌学研究极为重视，大力扶持。1951年改组原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石窟

得到了妥善保护。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艺术临摹品展览，并组织赴缅甸、波兰等国展览临画，扩大了国际影响。通过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石窟和遗书研究的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质和量上都有新的突破，具备了新的特点。

第一，资料方面：石窟艺术的临品、照片以及文字记录资料大量出版发行，为全面研究敦煌学在资料上提供了便利。资料发行范围很广，搜集也较完善，技术处理先进，伦敦所藏卷子被摄成缩微胶卷，50年代末开始为我国学者所利用。

第二，研究方面：(1)方法上由零散的、个别的研究转为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专著、专集。对石窟的研究也出现临摹、介绍和专题考释、全面研究并重的新气象。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开始出现佛经与壁画结合、遗画与遗书及石窟结合、遗书与壁画结合等立体性的交叉研究。这是一种比较符合敦煌学特点的新方法、新态势，虽处于尝试阶段，但进展很快。(2)研究领域扩大了许多：艺术研究方面，除了美术，还有建筑、乐舞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史地研究注重了敦煌地区与莫高窟。(3)研究专题向纵深开掘。

第三，理论方面：首先是全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指导敦煌学研究，这是敦煌学各个领域取得新成果的重要原因。唯物史观对宗教和宗教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对敦煌学的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开始了立体交叉的综合型研究。再有，开始了从总体上研究敦煌学，如苏莹辉的《谈敦煌学》、《敦煌学概要》等，对敦煌学的范畴、部类和历史发展作了初步探索。

第五期(1976年—1983年)，敦煌学新高潮。

本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著述有：段文杰的《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和《敦煌彩塑艺术》，李泽厚的《神的世间风貌》，史苇湘的《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日合出)，《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文集》(敦煌文物研究所)，叶栋的《敦煌曲谱研究》，阴法鲁的《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萧默的《唐代建筑风貌》，贺世哲、孙修身的《〈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王尧、陈践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姜伯勤的《敦煌寺院中‘梁户’的性质》，齐陈骏的《敦煌沿革与人口》，张锡厚的《敦煌文学》和《王梵志诗校辑》，高嵩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周大璞的《变文用韵考》(附《韵谱》)，张金泉的《曲子词用韵考》(附《韵谱》)，高国藩的《敦煌民俗学简论》，张鸿勋的《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潘重规的《敦煌俗字谱》，沈以正的《敦煌艺术》，以及唐长孺、姜亮夫、任二北等前辈学者和樊锦诗、马世长、刘玉权等人的有关论著等等。

1966年——1976年，敦煌学像其它学科一样，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大批研究者受到批判和迫害。但是，在这一时期，台、港地区学者的研究是有较大成绩的。如邱镇京的《敦煌变文论述》，罗宗涛的《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潘重规的《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敦煌变文集新编》，饶宗颐的《敦煌曲》、《敦煌白画》，陈祚龙的《敦煌资料考屑》，等等。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大陆学者也做了些研究工作，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72年发表的《新发现的北魏刺绣》，《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1974年发表的《敦煌晋墓》，等等。但从总的情况看，大陆敦煌学确实陷于停滞状态，而台、港资料限于条件，难以搜集，难免遗漏。

1976年以后，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敦煌学经历了恢复、振兴阶段，进入蓬勃发展的崭新时期。从1976年到1982年，短短几年间，敦煌学的各个领域成绩斐然，石窟研究尤有成绩。在此基础上，1983年8月1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全国首次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这是中国敦煌学史上的空前盛会，提交论文上百篇，老、中、青敦煌学者聚集一堂，交流经验、讨论问题、展望前景，从事各方面研究的专家们各抒己见，相互启发，为立体的宏观研究和传统的微观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总之，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的新高潮已经来临。这个新时期有许多新特点。

第一，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刊布更加系统化。伦敦藏卷、巴黎藏卷和“北图”藏卷都以全套缩微胶卷的形式提供出来，列宁格勒藏卷也开始整理出版了资料目录，这都便利了研究。石窟艺术资料的刊布也更科学、更系统。《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已经出版，获得好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即将出版。

第二，新人新作大量涌现，敦煌研究的骨干力量逐步形成，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已成为敦煌学界一支生力军。杭州大学、兰州大学分别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和研究班，中山大学、华东师大、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正陆续开设敦煌学课程。敦煌学研究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可喜势头。

第三，研究方法上，石窟与遗书、与其他历史文献相结合进行交叉立体研究的新方法更受到重视。根据遗书资料，从事实地勘查，进行对照研究的方法取得重要成果。在石窟断代分期上采用科学的考古排比方法，有了重大突破。

第四，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被不断开拓出来：藏文经卷的翻译与研究；敦煌民俗学的建立；敦煌寺院经济研究；敦煌石窟美学；敦煌学与敦煌学史，等等。这些